

总序

傅勇林

荀子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荀子·解蔽篇》）“虚”，然后“一”，然后“静”，然后而知“道”。本丛书名《静一述林》，取其深意也。

王国维曾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学与思皆应从“身之所容、目之所瞩、意之所游”三个角度出发，追求“境真”、“境实”、“境深”三种“境界”。但“境界”是一种深度创构，是“本”，“天怀意境之合，笔墨气韵之微”，“放之可弥六合”，而后可以求“道”知“道”，故应将其作为理想的学术追求，“持之以恒古今之作者”。本丛书体现了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全体同人如是学术旨趣——静虑澄心，“虚怀若谷，静一至道”。于学科建设而言，此为根本，当有深意焉。

“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全体同人恪尽职守，教书育人，同时“皓首穷经”，不断提升理论素养，拓展学术境界，提高专业能力。我们高悬起“学术境界”这把标尺作为理想的目标去衡量、读解与阐释外语教学生动的现实实践，试图以求“道”之旨“月印万川”，鉴照理论与教学实际，使其呈现“有我之境”。丛书的核心理论追求就是“求道”，并将其悬为映照万川之“月”，作为价值尺度，以求“学理”。有鉴于此，丛书各位作者在丰厚的实践层面中梳理甄别，洞幽察微，同时以各种理论资源作为鉴照，拈出其中之要旨并移入当下之研究，遂在传统研究模式之中注入深切之内涵，“所见者真，所知者深”，所论“豁人耳目”，可见出

笔墨“境界”，“理趣渐成”。

但是，“所知”因有“所见”，而“所见”当取定“立场”，首先解决“身之所容”，于是方有“目之所瞩”，从某一特定视角入手畅神而游，虽然“境界因地成形，移步换影，千奇万状”，“但游目骋怀，必是方得深景真意”。“意之所游”指“目力虽穷而意脉不断处是也”，这样“眼光收处，不在全图”，“合景色于草昧之中，味之无尽；擅风光于掩映之际，览而愈新”，“真境逼而神境生”，遂“境界全出矣”。但是，在“境真”、“境实”、“境深”三种内涵之中，前两者只是前提，“境深”才是关键，因为它强调境界的深层创构，认为学术境界并不是学术与教学实践单向度的经验再现。可以说，“境真”、“境实”、“境深”三种内涵以及“身之所容、目之所瞩、意之所游”三个层面不啻“学术境界”的生成机制，也是外语学科对其教学实践活动进行创造性重组的逻辑出发点。知识与实践单元的重组为知识纤维（命题、规律、原理）的抽取提供了条件，也是理论系统化的必然。外语学科建设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凿壁借光，以新的视野对各种理论与实践命题进行学术肌理上的知识注入，而后实施理论反思与创造性升华。升华后的知识与实践单元理论清晰度大大提高，也为外语学科理论的推演提供了学理基础。由于这些理论命题是在提取了相关的知识与实践单元以后所升华而成的，反映了其间的内在联系，所以应将其悬为外语学科建设一种普遍的学术追求。如王国维所说：“言气质，言格律，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格律、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三者随之矣。”故此，本丛书据于“境真、境实”，追求“境深”和“境界”，此为“学理”，亦是学术“理据”，我们正在“路上”，自当深长思之。

升华学术与教学实践，“入门要正，立意要高”，当“通大义，识大体，立根本”。外语学者或教师应学贯中西，“灵根自殖”，因为“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浅”，需如清戴震所言，追求“精审，识断，明辨，淹博”。“真力不至则精识不生”，然“学

充则文至”，“学充”要求中外学养统摄，本土域外新知融合，要呈“自足圆融”之象，博洽周流，左右逢源，“更行更远更生”。学术“非真积力久，亲证而后得”，据此而与同人共勉。是为序。

傅勇林

傅勇林，文学博士，教授，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目录

总序傅勇林 001

绪论 001

第一编 萌芽

西方空间理论的思想先驱

第一章 空间的生产 —— 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 023

第一节 构建（社会）空间本体论 026

第二节 空间政治经济批判 039

第三节 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开创性 050

第二章 异托邦 —— 福柯的空间理论 055

第一节 福柯的“异托邦”概念 058

第二节 权力、空间、知识 066

第三节 福柯空间理论对当代的影响 073

第二编 发展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

第三章 认知图绘 —— 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 081

第一节 后现代空间分析 084

第二节 后现代空间的特征及其把握 095

第三节 詹姆逊空间理论的后现代特色 102

第四章 时空压缩 —— 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107

第一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分析 109

第二节 后现代“时空压缩” 117

第三节 哈维时空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特色 129

第五章 第三空间 —— 苏贾的后现代地理学 135

第一节 重建社会理论中的空间本体论 137

第二节 “第三空间”理论 148

第三节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评判	160
第三编	对话	
	空间理论与当代西方文化批评	
第六章	权力的空间逻辑	169
第一节	福柯的空间化权力理论	173
第二节	当代西方文化批评对福柯权力理论的借鉴和运用	180
第七章	身体：作为空间和文化表征	189
第一节	回归身体	192
第二节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家对身体问题的思考	196
第三节	当代文化批评中的身体问题	204
第八章	全球化空间	209
第一节	资本全球扩张带来的新变化	211
第二节	文化全球化	217
第三节	“杂交性”文化	220
	结 语	227
	参考文献	231

绪论

纷繁复杂的当代西方学术往往被人们描述为各种“转向”：“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后现代转向”、“空间转向”等等。在这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转向”中，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后的“空间转向”，被认为是上世纪后半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政治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87页。。菲利普·E. 韦格纳（Phillip E. Wegner）也指出，当代西方“正在出现的跨学科格局把中心放到了‘空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的问题上” Phillip E. Wegner, “Spatial Criticism: Critical Geography, Space, Place and Textuality”. Julian Wolfreys, ed. *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80.，并且，在对“庞大的和多种形式的”空间研究作出过贡献的诸多学者中，既有社会理论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师，也有人类学家、哲学家、艺术批评家、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等。韦格纳所描述的这一现象和其所勾勒出来的诸多理论家，同时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空间”已经成为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领域内一个十分重要的热门话题，并且，“空间转向”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是与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领域内的其他转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相互交织，彼此促进，共同生长。

虽然，当代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对“空间”刮目相看，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的关注纷纷转移到对空间问题的思考上来，但是，由于“空间”本身还是一种处于不断变化中的话语，尚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在现阶段，要对整个“空间转向”作出一个全面的、肯定的、认识论上的陈述，条件还不够成熟。不过，由于“空间”已经深

刻地改变了当代西方批判理论的阐释视野，所以，当代西方学界开始对现阶段已经发生的、相对明晰可见的“空间转向”所迈出的步伐作出了初步的、反应性的评价。而在国内学界，“空间”问题尚未引起学者们普遍的关注。

在迈入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要与西方进行对话，而展开对话的前提，就是我们要对西方学界的各种理论有足够的认知和了解。基于这一要求，对当代西方理论“空间转向”现阶段的发展状况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分析就提到了议事日程。

—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文化批评”这个副标题，应该说已经是对全书整体的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但是，基于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文化批评”等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争议，所以，首先还是对标题中所涉及的几个基本概念作一些必要的界定和解说。

所谓“当代”，大体说来，它的时间范围是指 1968 年以后至今。学界对此，基本上已经有了较为广泛的共识，大致认为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标志了一个文化时期的结束。

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学界则一直都有争议。在本书中，笔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界定主要依照以下三个标准：第一，从地域上来说，主要是指西欧大陆各国；第二，与马克思主义有内在相关性，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主要从文化和哲学领域出发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批判的出发点是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第三，在当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阐释”或“重新构建”，探索实践的“新道路”。由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况较为复杂：一方面，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出于某些原因，并不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论辩传统进行论著；另一方面，有些既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衔，同时也并不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却以近似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思想和方法著书立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对那些已

经被学界公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进行研究并非难事，因为他们都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十分熟悉，并且也都非常明显地从不同方面“发展”或“重新解读”了马克思主义。但那些既没有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自称是非马克思主义者），而学界也没有给予他们这一头衔，但他们的某些著作却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人，对他们的身份进行界定就有些困难。有学者指出，他们可以被称为“文本马克思主义者”冯宪光《20世纪西马文论的本体论形态》，载《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笔者十分认同这一界定，所以，在本书中，确定一位理论家是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依据主要是文本，而非作者。本书所选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方面都与经典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有着或多或少、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另一方面却又有着主要是属于自己的，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明显有所区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各自的这些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构成相对比较复杂，并且有着较为鲜明的个人特色，但大致可以归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名目之下。

至于“文化批评”，笔者认为，它是一种对文本（包括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进行非文学性的、政治性解读的学术研究范式，涉及性别、民族性与民族认同、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种族、大众文化、身份政治、美学政治、文化政策、话语与人本性、重读历史以及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文化等诸多问题，其研究目的，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

之所以选择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文化批评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当代西方理论“空间转向”的真正形成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参与密不可分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代西方理论的“空间转向”，就是现代地理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而形成的。本书以五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分别是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爱德华·W. 苏贾 (Edward W. Soja), 对于空间问题的思考和论述作为切入点展开研究。之所以只选取这五位而非别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其原因主要有三个: 首先, 他们都阐述了各自颇有特色、自成体系的空间思想; 其次, 他们五人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彼此承继的关系, 而这种关系又体现出了当代西方理论“空间转向”的大致发展脉络; 最后, 在他们的空间思想中所凸显出来的一些问题, 同时也是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中的热点问题, 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论述, 对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然, 最重要的是, 他们的理论和相关论述对当前我国文化理论的发展、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学科建设来说极具学习和借鉴价值。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西方理论“空间转向”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真正地完成了空间、时间、物质三位一体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 空间和时间要么被唯心主义哲学家看做是感知者想象的产物, 如康德 (Immanuel Kant) 就认为空间和时间是“两种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 用为先天的知识原理” (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蓝公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0年, 第48-49页。 , 要么被唯物主义哲学家——从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 (Democritus) 到牛顿 (Isaac Newton)——看做是与物质相分离的独立个体。德谟克利特所谓的“虚空”德谟克利特认为, 世界上只有原子和虚空。空间, 只有在它作为虚空, 成为原子和由原子组成的物体的容器的意义下, 才和原子有联系。所以, 空间是同类的、连续的。空间作为虚空是原子运动的必要条件。和牛顿的观点——空间作为容器和舞台, “在那里分布着物体, 表演着事件”, “空间的各个部分和方面是完全同类的” (苏) 符·约·斯维杰尔斯基《空间与时间》, 许国保、戎象春、李浩然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第23页。——几乎是如出一辙。他们都认为空间是一种物理事实，既不受占据其中的事物的影响，也不受感知方式的影响。并且，牛顿还进一步将时间和空间提升到绝对的范畴。在他看来：

“绝对空间和时间不仅是独立地存在着，不依赖于物质的过程，而且彼此间也是互不依赖的。”（苏）符·约·斯维杰尔斯基《空间与时间》，前引书，第23页。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绝对时空的观点，并初步将空间和物质相联系。爱因斯坦认为，空间不是连续的、均衡的，在空间内部可以作更为详细的划分。同时，不能将物质与空间二者分裂，空间的特性与它所包含的事物处在相互的作用中。至此，物质与空间分离的状况开始有所改变。但是，最终完成将物质、空间和时间三者辩证地联系在一起这项工作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时间与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客观具体的存在形式。如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就说：“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空间和时间也不是现象的简单形式，而是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列宁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79页。空间、时间和物质三者由此划定并包容了自然界的基本特性，同样，空间性、时间性和社会存在则一起构成了人类生存的一切具体方面。空间-时间-存在三者之间这种在本体论上的三位一体，是一切社会理论的生成之源，通过它，人们可以看见历史、地理与社会存在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地理和空间直觉。马克思（Karl Marx）本人经常在他的作品里提到空间和地理的重要性，他敏锐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与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理活动和策略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资产阶级的发展将导致时间对空间的消解，空间形态由此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会出现重大转型。此外，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城乡对立问题的相关表述，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对空间社会性的强调，而

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更是或隐或显地涉及了世界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继马克思之后，列宁、卢森堡（Rosa Luxemburg）、布哈林（Nicolai Bukharin）、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等 20 世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关键人物对地理也很敏感，在他们的著述中也有不少对地理的论述，他们的这些著述更是进一步为对地理学方面的不平衡发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提供了丰富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但是，早在那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可小视的重要先锋。如在 1917 年与 1925 年之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里就曾经有过由城市规划者、地理学家和建筑学家联合发起的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空间组织”的先锋运动，其目的在于配合发生于苏联社会中的其他革命运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曾经对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早期阶段的欧洲城市和区域的各种问题作过很详尽的分析，尤其详细地阐释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及其强加的地域性劳动分工。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拱廊计划》和《旅途笔记》中，也对 19 世纪巴黎的空间与文化流动场所进行过细致的描绘。

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边缘性”有利于当代空间理论的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远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主要正统观念，对与劳动过程内部运行有关的各种传统的基础结构主题、在劳动场所就生产的各种社会关系问题所展开的各种斗争，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运动法则”很少关注。它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知识领域，不仅广泛扎根于大学的各个科系和研究中心，而且明显地表现出对哲学话语、方法问题、资产阶级文化评论以及对诸如艺术、美学和意识形态等主题的极大兴趣。应该说，只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边缘性”出发，才有可能从侧面走向一种正在崛起的后现代话语，才能不仅不将马克思主义仅仅看做是一种批判理论而加以

冷落和排斥，反而努力为其开辟一种有必要的空间化 —— 对空间性的一种唯物主义的阐释 —— 从而使其与具有权威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相抗衡。从这一点上说，正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才使得长久以来被历史决定论压制的“空间”得以浮出水面，发出自己的声音。

也正是基于上述几点原因，笔者才力求从理论层面上梳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揭示其大致的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与当代西方文化批评之间的联系。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评判优劣，而在于借鉴。

三

本书所要讨论的“空间”，并非物质空间或精神空间，而是特指社会空间。人们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才逐渐认识到：空间不是一个非物质性的观念，而是种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化身。在某种程度上，空间总是社会的空间，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正如列斐伏尔在 1974 年所说的，“就在不久前，‘空间’一词还有着严格的几何学意义，它给人的印象仅仅是一个空洞的范围……因此，一谈起‘社会空间’，听上去便显得不可思议。”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UK),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Blackwell, 1991, p. 1.

虽然对社会空间的系统论述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但这并不代表在此之前社会空间从未被关注过。在社会学领域，经典社会学理论大师，如马克思、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和西美尔 (Georg Simmel 又译作：齐美尔) 都或多或少地关注过社会空间，芝加哥学派 (Chicago School) 对此亦有所阐述。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里曾经指出，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的构造物，空间具有社会性；特定社会里的人会以同样的方式去体验空间；社会组织是空间组织的

模型和翻版。（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西美尔在《空间的社会学》一书中指出，空间正是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被赋予意义，从而由空洞的变为有意义的，空间因此具有五种基本属性：空间的排他性、空间的分割性、社会互动的空间局部化、邻近/距离、空间的变动性。林荣远编《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他的另一部巨著《货币哲学》则讨论了空间在货币经济下的转型：货币经济的发展导致空间失去重要性，社会组织和社会交往由此开始脱离空间。（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则是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城市空间作了较为直观的概括。在哲学领域，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存在与时间》和晚期的其他文章中对“此在”、“世界”和栖居等问题的论述也表现出对时间与空间的关注。在文学领域，米哈尔伊·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曾经对一系列小说中的“时空交错”、“文学中艺术地表达出来的时间与空间关系的内在联系”进行过详细的分析。Mikhail M.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ed. and translated by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p. 84. 总的说来，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前缺乏关于社会空间的清晰而系统的理论阐述，但却绝不缺乏具有洞察力的论述片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学者对社会空间的论述为当代西方理论的“空间转向”埋下了伏笔。

第一部关于社会空间的系统理论著作，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于1974年用法文发表的《空间的生产》。在该书中，列斐伏尔坚决抵制那种认为空间是一种先在的空无，是一个等待着被填充进内容的容器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社会中的空间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空间，自然空间虽然仍然是社会过程的源头并且不会完全消亡，但现

在主宰人类生活的却是社会空间。他进而提出了一种关于空间的社会生产的理论，即认为空间在根本上是依靠并通过人类的行为生产出来的，它“既不是由事物的堆积或数据的汇聚构成的，也不是由一个可以塞满各种内容的容器那样的空无构成的……它不能简化为一种强加于现象、事物、物质性的‘形式’”。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bid*, p.26-27. 并且，他还坚持认为：

“（社会）空间并不是一种在其他事物之外的事物，也不是一种在其他产物之外的产物。确切地说，它纳入了自身所生产的事物，包含了它们在同存共在时的相互关系——它们的有序或无序。”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bid*, p.73. 换言之，空间包含了多种复杂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这样的空间绝对不会是一种单一体，势必会存在一些其他的维度，所以，列斐伏尔试图提出一种既可以考虑空间的各种维度，同时又可以将它们纳入一个连贯的整体之中的空间“三元辩证法（triple dialectic）”。列斐伏尔认为，任何由社会生产出来的空间都是由“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再现（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再现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三者辩证地组合而成的，它们各自又与“感知的（perceived）”、“构想的（conceived）”、“实际的（lived）”其中一种特定的认知方式相连。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的这三个层面中的第一层属于社会生产、再生产和构建等最为抽象的过程，第三层主要是具体化了的个体文化体验空间以及构成它的各种符号、意象、形式和象征，第二层则涉及我们对空间的界定，它调节着其他两个层面，并把所有这三个层面凝聚成一个连贯的整体。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理解，对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全球化趋势——他称之为“抽象空间”：一种在“空间实践”层面上的同质性和在“再现空间”或“实际的”经验层面上的分裂与隔离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bid*, p.291.——进行批判，并期待一种

“差异空间”——社会主义空间的出现。应该说，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正式拉开了当代西方理论“空间转向”的序幕。

就在列斐伏尔深入而系统地思考当代西方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空间性的同时，法国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柯也在关注空间问题。福柯敏锐地注意到了空间和时间观念在西方人文、社会学科中的不平衡发展：空间长期以来被看成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法的和静止的，并成为与时间及其所代表的丰裕性、辩证性、富饶性、生命活力等相对立的概念。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translated by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1980, p. 70. 空间呈现为一种历史-政治问题是较为晚近的事情。福柯指出，19世纪沉湎于历史，一直与时间相关的主题所纠缠，如对历史的迷恋，对发展、悬置、危机、循环、过去、人的死亡等的关注，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还未终结，一种在本质上是历史的认识论继续蔓延于现代社会理论的批判意识中。而20世纪则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正处于一个同时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juxtaposition）的时代，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与其说是在时间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漫长生命的经验，不如说是同时联系着各个点并与自身交叉在一起的网络经验。Michel Foucault, “Texts/Contexts of Other Space”, *Diacritics*, 1986, 16(1) (Spring), p. 22. 福柯甚至断言：“从各方面看，我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时间对我们而言，可能只是许多个元素散布在空间中的不同分配运作之一。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主要与空间相关，而与时间无甚关联。” Michel Foucault, “Texts/Contexts of Other Space”, *Diacritics*, *ibid*, p. 23. 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著作大都涉及空间问题。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形成我们现代世界的空间转换的详尽历史，并且还从权力在空间中对身体进行规训的角度考察现代社会权力，以身体和空间为中介提出了“权力/话

语”、“权力/知识”模式，突破了传统权力理论对宏观权力的论述，对人文社会知识学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后现代理论，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都从福柯那里得到极为重要的启发。

四

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家们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以及构建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空间意义重大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作为对现代主义的反叛，后现代主义试图恢复那些被现存的各种社会、文化理论和认识论所排除的东西，“空间”就是其中一员。为了对现代性理论赋予时间和历史以优先性进行批判，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极力提倡空间意识和地理学想象，并大声地宣告当前空间的优越性。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一致呼吁要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广泛的空间化，其态度之明确前所未有，这不仅是向对空间熟视无睹的传统思想的巨大挑战，更使得空间问题逐渐成为西方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理论的一大热点问题，空间理论与空间批评也由此成为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Franc' ois Dosse），在其有着“法国文化革命的百科全书”盛誉的巨著——《从结构到解构》中指出了这种空间转向的特质，他说，在后现代，“历史意识受到了星际意识、地型学意识的压制，时间性移向了空间性”。“后历史带来了历史与‘膨胀的现在’的一种新关系”。（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 20 世纪思想主潮》上卷，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第 470-473 页。

后现代理论家们试图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引入空间/地理学的想象力，在理论或实证层面上丰富了对空间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空间观念在当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但严格说来，继列斐伏尔和福柯之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大体上是围绕两个维度展开的：其一，由于后现代时期的到来导致了空间的扩张、分裂与变动，

詹姆逊和哈维在面对这种转变时提出了各自相应的概念以回应后现代时期的空间转型。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并且，“后现代就是空间化的文化”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6.。哈维则指出，“后现代主义是对空间与时间的一系列新体验的某种回应、是新一轮的‘时空压缩’。”（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54页。其二，开始致力于整合不同理论家对空间的论述以形成具有一般意义的后现代空间理论，这种趋向在当前以爱德华·W. 苏贾为代表。

詹姆逊在其1984年发表的长文《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作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分，即“后现代就是空间化的文化”。他认为，空间在后现代社会的构建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特定的空间转换是正确区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更为有效的途径之一。詹姆逊具体分析了建筑和影视作品中的后现代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模式的变化，衍生出了不同以往的跨国性空间结构，这种空间结构既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存在的现实依据，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模式自身的一种空间属性。他进而分析了后现代空间的基本特征，并指出，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化艺术的政治使命的发掘依赖于一种全新的美学阐释，那就是以空间概念为基础的“认知图绘”美学，这种美学呼唤“在文化逻辑和后现代主义的诸种形式中，体察权力和控制的一种工具性制图法的能力”（美）爱德华·W.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96页。。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实现了苏贾所提出的三条空间化途径的交汇：以空间作为分析问题的本体，进而透过后现代主义文化去深入分析后现代空间结构，及其得以形成的、历史和现实的基础。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展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传统与现代地理学分析二者